王鼎钧

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现居美国纽约。曾任广播公司节目制作组长，报纸主笔及副刊主编。作品以散文为主，获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贡献奖

王鼎钧先生在纽约家中通过视频发表感言

【感言】记得这家报纸，也就记得这个城市

□王鼎钧

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作家，这个名称多彩多姿，朝气蓬勃。我岁数这么大了，还能得这么美丽的一个头衔，好像世界上没有病毒了，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个感觉非常好！

都说文学是文化的花朵，花朵好看不好“吃”，这个时代，平面媒体经营困难，外面很多报纸刊物不登文学作品了，他们不种花了，他们专门种能吃的。羊城晚报始终维持文学花园，用心经营，很了不起！它不断想办法提高作者写作的热忱，增加读书阅读的兴趣，像设立花地文学榜就是其中一项。

中国的新文学——我是说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白话文学，它能够那么快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多亏它搭上了报纸副刊这辆顺风车，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意外贡献，这个贡献非常之大！如果没有报纸的副刊，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都不是这个样子，王鼎钧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和副刊有特殊的因缘，有人问，你旅行到了一个城市，用什么方法纪念这个城市，是爱一个人还是买一双鞋？我到一个城市先看当地的报纸，打开报纸先看文学副刊，副刊是我的第一版，是我对一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我会记得这家报纸，也就会记得这个城市。

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报纸副刊发表的，我写了文章首先投给副刊，我一生都在为副刊写文章，我对副刊有深厚的感情，副刊主编都是我的伯乐，我的知音。花地副刊年度作家我能上榜，我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年度散文

《江河旋律》

【致敬辞】

王鼎钧是当今华文文坛依然坚持创作的最高龄作家。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辗转于世界各地，他以大慈悲情怀记录历史，以真、醇、理、趣笔致洞见人心。

《江河旋律》是其最新自选散文集，精选平生作品中美文、杂文、变体文三辑，字字蕴珠玑，篇篇见性灵，有历史颖悟，有禅茶心境，有存亡兴叹，有俗世滋味。展卷细读，如观奔流江河，悲欣皆为序曲；纵览世相人间，爱、美终成智慧。

【专访】王鼎钧：我们都活在很好的世代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1 长寿没有“秘诀”，提倡“牺牲健康”哲学

羊城晚报：先从您的写作谈起？

王鼎钧：建议不要谈文学写作了，总是那几个问题，我都写过了，出了书了，我现在也没有新的意见，再从书上拷贝回来没意思。咱们是晚报，访谈可否轻松一点？

羊城晚报：好吧，那就谈生活。长寿的作家好像不多，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王鼎钧：我没有养生秘诀。我青年时期所受的训练，所处的境遇，都是教我们牺牲健康。依当年的价值标准，养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我从未预期能活这么久。

羊城晚报：没有“秘诀”而能如此高寿，回顾总结，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鼎钧：实在答不出来，在唯物论的大门口，我总不能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羊城晚报：您现在一般的日常作息时间（典型的“王鼎钧时间”）是怎样的？

王鼎钧：我先后在报馆工作甚久，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出国以后，住在西半球，主要的因缘牵挂仍在东半球，两地时差正好十二小时，夜间工作仍有必要。都说夜间工作影响健康，好在我有“牺牲健康”的哲学。

羊城晚报：“牺牲健康”的哲学？

王鼎钧：我说“牺牲健康”的哲学有开玩笑的意思，事实上我并未读到成文的有系统的理论。当年的教育告诉我，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冲突，个人增一分则群体损一分，因此提倡损己。

2 对子女教育很开放，但老两口的生活是“中国式”的

羊城晚报：有关您的家庭情况很少见诸报端，能否介绍一下？家人读您的作品吗？

王鼎钧：我的长子学工，次子学商，女儿学医。他们在国外受教育，中文程度仅能应用，不能审美。我也不写他们，我认为他们只要在本行本业受人注目就好，不需要更多的干扰。

羊城晚报：亲情、爱情是人生的支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能是一种羁绊，您认为呢？

王鼎钧：我认为婚姻需要感情也需要爱情，感情维持日常生活，爱情支持非常的遭遇。一般来说，夫妻在年轻的时候靠感情，到了七老八十靠爱情，安居乐业的时候靠感情，颠沛流离的时候靠爱情。所谓非常的遭遇也包括陈世美点了状元，新移民中了五亿美元的乐透大奖。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或者结婚了不愿意生小孩，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鼎钧：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爱情失望，对婚姻失望，他们只需要男女关系，而且要把成本降到最低。他们自认为这是聪明智慧，摆脱了大自然的圈套支配。这是一时的潮流，潮流不能永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羊城晚报：这样看来，可不可以说您的婚姻家庭观是趋于传统的？

王鼎钧：您说的“传统”是指保守吗？我们老两口对子女的教育很开放，让他们能够适应美国社会。关起门来，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中国式的。

羊城晚报：您上菜市场买菜吗？会做菜吗？

王鼎钧：我有过几段独居的日子，早期，我得天天吃小馆，花钱多，清洁卫生也有问题。后来有了电锅、微波炉、冰箱，超级市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菜市场，食物都经过处理，分类包装，这时候自炊就容易了。

我常劝人减少外食，既节省开支，也保障健康。我常劝年轻人学点烹饪，尤其是女孩子，烹饪可以使她在社交上、在择偶时增加优势。

羊城晚报：您是山东人，在美国能品尝到正宗山东菜吗？

王鼎钧：鲁菜目前在没落之中，川菜、粤菜当令。我现在味蕾萎缩，每天吃的是钙、淀粉、蛋白质，美食对我已无意义。

许多外国人赞美中国菜，我们对中国菜也颇有自信。到了纽约的曼哈顿，才发现每一个民族都有美食，也发现中菜的缺点。中式烹调强调味觉，忽视营养，还有，吃中国菜最好趁热，不宜外卖。

3 活在很好的世代，无悔有憾

羊城晚报：在您的人生中，应该不止一次有类似遭遇疫情的经历，对这次疫情有什么不同的观察、感悟？

王鼎钧：大疫蔓延，我想到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回应”。病毒向人类挑战，在我居住的地方，平民百姓的生活圈里，网购的回应正确，邮局的回应错误，医学的回应正确，宗教的回应错误，供给精神食粮的媒体回应正确，供给物质食物的餐馆回应错误……是否能回应，回应是否正确，决定一个人、一个行业、一个社会的兴衰。

羊城晚报：如果可以选择，您更愿意生活在哪里、在哪个年代（朝代）？

王鼎钧：忘记了是哪位作家提出来一个问题：你认为贞观之治比现在更好吗？我的答案是“不”。我认为你我都活在很好的世代，当然也常常觉得不满意，但是可以“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

羊城晚报：回顾一生，是否也想过“假使可以重来一次”？

王鼎钧：我不希望重来一次。人生有很多必然，也有一些偶然，即使“必然”可以重来，“偶然”不能重来。

羊城晚报：有没有什么事让您后悔的？

王鼎钧：我做的那些决定，都是只有那样做，必须那样做，我承担后果，我不后悔，但是有遗憾。“憾”和“悔”不同，我无悔，有憾。

羊城晚报：遗憾是什么？

王鼎钧：真正的遗憾是说不出来的。北宋文人彭渊材说他有五大憾事，鲥鱼多骨，金桔太酸，莼菜性冷，海棠无香，曾子固不能诗。我现在向他学习，你给我千斤，我还你四两：我一恨孔夫子删诗太多，二恨红楼未完，三恨野草太少。《野草》是鲁迅先生的那本散文集，如他的杂文能少几本，薄一点，《野草》能多几本，厚一点，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将是何等光景！

羊城晚报：对于决心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您有什么建议？

王鼎钧：写作是“在共同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独特成就”，共同的基础有方法，个人独特的成就没有方法。共同的基础要勤奋，个人独特的成就要天分。我晚年喜欢跟年轻的文友谈方法，因为自己写不好，希望别人写得好。所谓方法也不是什么秘诀，都是公开的知识，但是“方法”必须是行为，一旦成为“知识”就没意思了。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斯奋（左）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社长李时平（右），一起为阎晶明颁奖

【感言】批评和创作要形成交流对话

□阎晶明

在我心目中，《羊城晚报》是一份活跃而有品位、有担当的报纸。还记得4年前在广州，我曾经见证了《羊城晚报》为了助力文学事业，组成专业团队，打造融媒体文学评论平台的新举措。今天，我本人有机会接受《羊城晚报》授予的有关文学评论的荣誉，荣幸的同时倍感亲切。同时也很荣幸再次来到深圳。

完成这部著作，让我对文学研究与评论的意义、价值和作用有了新的感悟。文学评论不应该纠缠于一些外围性问题重复表态，比如关于如何制止虚假的吹捧，如何看待无边界的酷评，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和笔墨，而真正属于文学批评的内部问题得到的探讨却越来越少。

批评家面对作家作品时，既要显示真诚的态度，对创作者的必要尊重，又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可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独特见地，以求得和作家形成真正的交流与对话。研究和评论一部作品，既要重视文本，也要留心并知悉作家创作的背景、环境、情感状态，还要适度了解作品的发表、出版、改编以及读者接受等传播史。做到这种立体的观察，一定会有助于提高文学评论与研究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获得花地文学榜这一荣誉最有信心的一点是，评委们和主办单位的朋友们，在文学评论的理念上和我达成了最大限度的一致。果真如此，我会感到格外的欣慰。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文学这块花团锦簇之地永远枝繁叶茂，百花竞放！（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阎晶明

1961年出生于山西偏关。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出版有著作《独白与对话》《我愿小说气势如虹》《鲁迅还在》十余部。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年度文学评论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

【致敬辞】

在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中，阎晶明不避险难，以执着的情怀，稳健扎实的研究，不断地抵近鲁迅的世界。

《野草》被认为是鲁迅最深晦、玄奥的散文集。阎晶明钩沉稽隐，以“本事考”的方式，还原其创作背景，对其诗性哲学作出新的阐释，拓展《野草》研究的学术空间。这既是阎晶明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一次成功的学术实践，也是他长年致力于鲁迅研究而启动的一次“箭正离弦”。

【专访】阎晶明：不断抵近鲁迅的世界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1 “本事”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

羊城晚报：阅读《箭正离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流畅，一改以往看研究鲁迅文章的艰涩感，这种简明的语言风格是您有意为之吗？

阎晶明：这本书其实是以一本以学术态度进入的散文随笔，写的时候我的确有意追求这种文风，但是没有专门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太相似了，太格式化了，当然研究各有各的价值，但是像鲁迅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我觉得特别需要专业的研究者以自己的专业水平，学术的准备和能力，把鲁迅推向社会，让更多公众了解鲁迅作品的真正价值和艺术魅力，包括鲁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学者都应该有这种自觉。

羊城晚报：一般做研究都是分析文本的精神内涵为主，您为何会反其道而行之，从“本事”入手？

阎晶明：就像你一开始说的，作为一本表达鲁迅哲学观的散文诗，《野草》在很多读者看来都是比较晦涩难懂的。无论是阅读、解读还是研究，大家会关注文本中每一句话背后的深意，到底象征着什么，隐喻着什么。

但是在我看来，事实上《野草》不是鲁迅从大脑中空想出来的结果。我研究时发现书中绝大部分篇章里其实都有很多现实的依据。对《野草》的研究和阐释，不能离开现实中的烟火气。它们有大有小，有对人生的解剖，也有对现实的关切，有对强大人类共性的描写，也有对稍纵即逝个人梦幻的捕捉。

理解《野草》离不开这些具体的情节，甚至书架上的一册书，书桌上的一盏灯。这就是我所谓的《野草》的本事。我从本事切入，是因为我认为这应当成为理解《野草》的一把钥匙，是接近鲁迅、理解鲁迅的一个通道。如果一直把作品当成象征物，那我们会忽略很多东西，很多研究也变成空转式的。从这些具体的情形切入去读鲁迅，你会发现也没有非常困难，也更有助于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

2 不要“神化”，也不要庸俗化

羊城晚报：关于鲁迅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了，有人质疑我们是不是高估了鲁迅的成就，对此您怎么看？

阎晶明：写完该书，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鲁迅思考的深度、艺术表达上的高度，以及他对生活观察的敏锐度，同时他能把这三者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在融合交错碰撞后，还能产生出更加复杂多重的内涵。我觉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他相比的。

羊城晚报：为何我们对鲁迅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

阎晶明：因为鲁迅确实不仅仅是作家、文学家，他同时是思想家，而且他也是一个多重地参与社会工作，甚至社会斗争的革命家，所以我认为用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来概括鲁迅是非常准确的。

鲁迅身上所承载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文学的高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个时期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化所达到的一个高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鲁迅当然是以文学界为主，但是我认为应该也不限于文学界。

羊城晚报：今天我们对鲁迅的研究是否有一个重心或者落脚点？

阎晶明：过去我们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现在我们又让他回到人间，就变成一个跟普通人一样的人，所以他也有生活情趣，他也爱吃爱玩，这些都没错。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经典性和最伟大的作家，我们还是要研究、要寻找他身上不同寻常的地方，超越一般人的地方，不要“神化”，但是也不要把他庸俗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符合历史事实的鲁迅形象。

3 专业学者应放下身段去传播鲁迅

羊城晚报：用一个时髦词，鲁迅在网络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大IP、大网红，他之所以可以跨时空传播，与他的创作方式、作品特色息息相关？

阎晶明：是的，鲁迅作品的语言本身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就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同样一句话，它既是直接针对当下的某个对象，也有可能被别的方式表达别的事情的时候借用。因为鲁迅总是在描写具体的事情上能够超拔那么一点，但是超拔的那一点就非常了不起，就使他的语言更具流动性和丰富性。

现在网上很多人引用鲁迅的“金句”，有的是个别人编造的，也有很多的确是鲁迅说过的。为什么这么多人用？就是因为即便在不同的心情、背景、语境、环境下，你读他的某句话，也能感觉会心一击，不同的人能够做出不同的解读，这就是鲁迅作品的特色和魅力所在。

当然，鲁迅也说过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其实这表达的是他对国民性改造的迫切心情，他觉得倘若现实改变后，那么他的文章也就无效了，如果他的文章仍然是有效的，那说明他批评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也反映了鲁迅是一个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非常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作家。

羊城晚报：现在都说文艺的阵地在哪里，文艺批评家就该在哪里。您如何看待鲁迅及其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

阎晶明：我觉得总体上对于传播鲁迅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网上还有人把鲁迅的《野草》改编为说唱，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当然网络传播过程中也有一些错谬，但在我看来这就是鲁迅研究者的责任所在。面对流行热议中产生的误读，研究者应该及时指出来，尽可能为大家呈现一个真实、准确、生动的鲁迅形象。

虽然每个人能做的都是有限的，但是老一代的鲁迅研究者中已经有人开始在做了，针对网上出现的一些说辞或者议论，选择其中一些重点进行辨析更正。

鲁迅研究界高水平的学者是非常多的，但是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些学者能够放下身段，能在鲁迅的社会传播方面发挥更重要、更主流的作用，但是这也急不得。